

中國大陸比較教育學研究之發展與評估 ～一九四九年迄今

周 祝 瑛 *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及評估中國大陸自 1949 年以來，比較教育學門之發展與趨勢，並根據歷史演進分成六個階段，透過比較分析的方式，針對學門研究之基本思想、研究取向、研究機構與學會、研究人員背景、研究生培育工作及研究成果等方面加以探討，輔以四種期刊之內容分析，以了解與評估中國大陸比較教育學研究之發展況狀與未來趨勢。本研究採用訪談、問卷調查、內容分析及文獻分析等方法，探討並比較各時期之研究重點及其與大陸教育改革所產生之作用。最後並針對海峽兩岸比較教育學門研究之發展趨勢加以比較，期能發揮相互對照與學習之效。

壹、緒論

早在 1949 年以前，中國大陸即有比較教育學的論著和譯作，在高等師範院校中也開設了比較教育這一學門（吳文侃，民 81）。到了 1949 年以後，隨著大陸政治情勢的變化，比較教育因其重視對外關係的本質，一度受到影響。一直到 1978 年以後，在大陸當局強調「四個現代化」與「三個面向」的口號下，比較教育學又得以迅速發展；在研究人員的擴充

* 作者為本校教育學系副教授

上、在高等院校的科系設置上，以及在比較教育研究的成果方面，都獲得肯定；其研究題材，不但包括各級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階段），且範圍遍及先進與第三世界國家的教育經驗（黎安琪，1992）；另外，大陸亦於1984年加入世界比較教育學會（World Congress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銀行（World Bank）也投下大量貸款，協助大陸從事教育革新，加強其與世界各國的聯繫工作（Altbach & Kelly，1986）。

自1980年代以來，隨著大陸對外開放步伐加速，比較教育學門由原先邊緣性質的分科，轉為今日備受矚目的專業領域，究其原因不外有以下幾項：

(1)文革以後，百廢待舉，許多人對教育寄予厚望，認為教育是唯一可以完成「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任務，也是可為「四個現代化」服務，通往具有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最佳途徑。

(2)比較教育學門能夠打破教育各領域，邁向科際整合，並結合海內外教育理論與實際，促進世界各國相互比較及學術合作（徐輝，1991）。尤其在對外關係急遽發展中，比較教育學能夠透過介紹、分析及比較的方法，從中國大陸本身教育問題作出發，去研究當代世界不同國家與地區的教育實況，以應證教育理論，並分析影響各國教育發展的主要條件和因素，如：應用要因分析法（吳盤生，1992；Zachariah，1986）或科學實證研究的方法（Noah & Eckstein，1985；Anderson，1961；Ragin，1989），找出教育發展的規律與趨勢，以作為制訂中國教育政策的參考（顧明遠，1990；楊思偉，民82）。

(3)隨著大陸與世界主要國家經貿關係的日益密切，大陸亟須具備國際眼光、了解國際動態的專業人才。透過比較教育，正可養成「三個面向」——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人才（郭笙，1989）。

(4)自1985年大陸公布「關於中共中央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後，先進國家的教育經驗被列為「六五」時期社會科學的研究重點。因此，大陸上的比較教育學門，不但出現了大量的翻譯、論述等作品，許多高等學校（如師範院校）也紛紛設立該學門，培養為數不少的博、碩士班學生；同時國外留學生也學成返國投入該教學研究領域，為比較教育帶來新的活力。

中國大陸比較教育學研究之發展與評估～一九四九年迄今

反觀台灣地區，在整個社會邁向現代化、國際化的同時，成立於 1974 年的「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二十多年來致力於國際及比較教育領域之耕耘；不過，由於台灣本身學術人口的比例較低，長期以來也缺乏如大陸地區的比較教育專責機構，直到一九九五年首度於暨南國際大學成立「比較教育研究所」，正式成為台灣面向世界、面對未來的比較教育學術機構。

因此，隨著兩岸比較教育學界人士交流日益頻繁，透過對大陸一九四九年以後比較教育學門之研究，一方面可參考大陸該領域之發展經驗，尤其改革開放以來，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交流之狀況；二方面比較兩岸比較教育發展之特殊背景與異同，以收相互觀摩、學習之效；最後，可提供台灣日後拓展比較教育研究主題與人力之借鏡，尤其在研究成果與教育政策間如何緊密結合，以作為台灣邁進二十一世紀教育改革之參考。

有鑑於此，本研究目的在於調查及評估自 1949 年以來，中國大陸比較教育學研究發展之經過與特色，包括：學門發展與大陸社會演變之關係，本身專業領域中基本理念、研究機構、人員及成果之狀況、未來發展趨勢，及其對大陸教育政策所產生之影響。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訪談及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等方法。在文獻資料方面、首先針對大陸及台灣出版的比較教育專書與期刊進行文獻的蒐集與整理。其次透過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比較教育研究所合作的方式，實施「中國大陸比較教育教學與研究調查問卷」工作，對大陸二十餘所主要相關機構進行調查。在訪談方面，透過三次訪問北京師範大學與出席第七、八次中國大陸比較教育研究年會的機會，進行學者、專家與研究生的訪談工作。最後針對四種大陸比較教育期刊：「比較教育研究」、「外國中小學教育」、「外國教育資料」及「外國教育研究」，進行歷年來之內容分析。（註一）

貳、比較教育學研究之發展趨勢

中國大陸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比較教育之發展應屬海峽兩岸日後演變之基礎。根據大陸學

註一：本文呈蒙上海華東師大比較教育研究所馬慶發博士及政大教育所博士班陳木金先生之協助，以及國科會之經費補助，特此致謝。

者吳文侃與楊漢清在《比較教育學》一書中，將中國比較教育研究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民 81）。首先為 1840 到 1900 年以前的第一個階段，此時期的特點在於結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介紹外國教育狀況，借鏡外國教育經驗，改造本國教育體制；此時期的比較教育研究仍在起步中，尚未形成正式學科。到了 1900 ~ 1940 年代的第二階段，中國比較教育研究逐漸從教育學科分支出來成為獨立學門。此時期的比較教育研究雖然仍在為國內教育改革找尋學習對象，並為比較教育課程提供教材與參考資料，但與第一期相比，此時的研究對象範圍（如主題和國別）較前期擴大，研究成果相地增加，並且建了我國三種重要的比較體系，如：1. 以教育主題為首的「問題比較體系」；2. 以國為單位，全面介紹各國教育狀況的「國別教育體系」；3. 為「綜合體系」，顧名思義即以國別敘述為主，加上教育問題的比較分析，此時期的中國比較教育研究逐漸建立本身的特色，研究方法上多採取折衷方式。總之，三種比較教育體系各有所長，表現出當時國內該領域研究多采多姿的一面。到了 1949 年以後，台海兩岸長期分隔，比較教育研究在兩地各有不同的發展。在大陸上，比較教育學歷經了一段相當曲折的過程，由原先的向蘇聯學習借鑑，到文革期間的全面禁止，一直到改革開放（1970 年代末期）後重新獲得肯定：一方面確定了社會主義的領導思想，另一方面建立擴大研究機構及人員，提高研究水準，在大學院校開設比較教育學課程，更進一步拓展國際學術的交流與合作。無怪乎有學者指出，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大陸比較教育研究的發展受到中共當局國家政策搖擺不定的影響頗大，隨著各時期對外關係的重視與否，一方面扮演借鑑外國教育經驗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必須具備批判、鑑別的能力，經由比較研究，評量某項政策或改革措施，是否符合教育的基本原則和世界潮流（金世柏，1993）。

根據孫啓林等人綜合各家的說法，自 1949 年以後，比較教育學研究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孫啓林，陳欣，1995）

（一）偏頗階段（1949 ~ 1963）：

由於國際上的孤立與中國大陸內部的種種問題，1950 年 8 月公佈高等教育課程規定，明訂所有大學教育系不准設立比較教育課程，藉此否定西方歐美的教育制度與經驗；然而另一方面卻又大量研究前蘇聯的教育制度和理論，翻譯許多蘇聯學者的著作，如凱洛夫（1893 ~ 1978）的《教育學》和麥丁斯基（1885 ~ 1957）的《世界教育史》等書。此時期的比

較教育學研究可說是向蘇聯一面倒的情況。

(二)初創階段（1964～1966）：

五〇年代向蘇聯一面倒之後，到了六〇年代初期由於“中蘇關係交惡”，中國大陸逐漸與世界各國交往，有鑑於此，1963年12月周恩來等在國務院外事工作會議中，提議設置研究外國問題機構，1964年2月11日在北京大學創設「外國高等教育資訊資料室」，在清華大學設置「外國技術教育資訊資料室」，此外，還在下列高等院校設立有關機構，例如：北京師範大學的「蘇聯教育研究室」、華東師範大學的「西歐、北美教育研究室」、東北師範大學的「日本教育研究室」和「朝鮮教育研究室」、河北大學的「日本問題研究室」（含日本教育研究組）。截至1964年中期，總共在北京、廈門、中山等十八所大學設置研究外國問題的機構。1965年開始由北京師範大學發行「外國教育動態」雜誌，堪稱中國大陸第一本有系統介紹外國教育的期刊。這個時期可說是為比較教育學門，建立了小規模的研究隊伍與出版少量的研究成果。

(三)停滯階段（1966～1976）：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由於基本上否定和排斥外國教育經驗，上述研究外國教育的機構被毀謗為「資本階級和資本主義教育觀的大本營」（大塚豐，1990），遭到關閉。因此，比較教育研究被迫一度中斷，例如：北京師大發行的「外國教育動態」雜誌在1966～1972年即遭到停刊，到了1973年才重新復刊，逐漸恢復比較教育之研究。

(四)勃興階段（1978～1985）：

文革結束以後，在「四個現代化」與「三個面向」政策下，比較教育研究獲得平反。尤其在七〇年代末期改革開放以後，除了恢復原有各大學的外國研究機構，在高等師範院校中開設比較教育課程，並且大量翻譯外國教育書籍，介紹國外教育狀況，例如：《教育的傳統和變革》、《日本的經濟發展與教育》、《蘇聯教育的政策法令匯編》以及中國大陸第一本教科書『比較教育』。（顧明遠，1991）隨著大陸上改革開放步伐的加速，此時期從事比較教育研究與教學的有關人員在數量上大為增加。

(五)重點發展階段（1985～1990）：

1985年中國大陸公布了「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除了

客觀描述與介紹外，尚須透過對外國教育的分析與評價，對不同的教育狀況進行比較，以找出適合中國大陸教育發展的學習經驗。此時期的比較教育研究（尤其針對二次大戰後發達國家的教育研究）被列為「六五」與「七五」的重點社會科學專業領域，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例如：《比較高等教育學》、《現代課程論》、《當代蘇聯教育家的新思想》、《別國的學校和我們的學校》和《世界教育危機》等。同時期，幾所高等師範院校，如北京師大、華東師大等學校也先後設立了比較教育學科的博士、碩士課程，專為比較教育培養專門人才；此外，從國外留學返國的博士人才也加入比較教育研究行列，成為該學門的生力軍。

（六）調整階段（1990～迄今）：

隨著九〇年代大陸市場經濟的發展，比較教育界面臨新的挑戰，如：怎樣從外國發展經驗中，進行調整與適應，找出本國教育模式的參考等一連串問題。誠如中國大陸比較教育研究會理事長顧明遠指出，目前大陸比較教育研究中存在著幾個問題，如：（一）研究與現實脫離，亦即許多比較教育研究工作者大多鑽研外國教育，反而不了解大陸教育現況；（二）比較教育的研究缺乏理論依據，大多研究僅止於表面介紹和描述，缺乏從分析比較中找出定律與原則，俾供借鑑與學習。

另外，中國大陸杭州大學王承緒亦指出，目前各大學開設比較教育課程中所遭遇的問題，包括：比較教育理論（theory）、研究架構（research framework）、方法論（methodology）等方面的有待建立；而研究過程中對於教育制度（education system）與研究單位（research unit）的選擇標準，也值得進一步探討。（周祝瑛，民82）因此，九〇年代中國大陸比較教育學界亟須調整因應的措施有幾：（顧明遠，1991）

1. 改變過去完全以外國教育為主的研究重點，從中國大陸教育實況出發，結合本國教育發展的需要，透過中西方比較分析，解決中國目前重要的教育難題。
2. 擴展研究領域：一改過去以歐美發達國家為主的研究，轉為對與中國大陸國情相似的亞洲國家教育的探討，不僅止於比較各國教育制度本身，更須進一步深入了解教育與各國歷史文化背景因素之關聯，做為整體參考的依據。
3. 加強比較教育學科的專業地位：如同世界各國比較教育學發展歷史中所遭遇的問題，中國大陸的比較教育研究也同樣面臨著研究方法、理論與主題方面的爭議。如何充實

研究隊伍，加強研究成果的學術性與應用性，是中國大陸比較教育學重新面臨的挑戰。

參、比較教育學研究之現況分析

文革結束以來，中國大陸希望藉由四個現代化的推動，促進改革開放的腳步。而做為研究國外經驗、了解外情的教育窗口（window）——比較教育研究——自然扮演提供教育政策與改革方針的重要角色。尤其在國際學術交流日益頻繁之際，中國大陸急於向西方世界大量吸收資訊與經驗的同時，比較教育研究能否對國家發展及四個現代化提出貢獻？比較教育學本身在研究機構、人員、成果及課程等方面起了何種變化？是否也受到市場經濟的興起而產生影響？本節擬從這些方面去探討當前中國大陸比較教育研究的現況，並進一步加以分析？

一、基本思想與研究取向

綜合大陸比較教育學者王承緒、周南照、吳文侃、金世柏及楊漢清等人一致的看法，認為中國大陸比較教育學的研究目的在於借鑑外國的經驗，改善中國的教育，並做為政策擬訂的參考（Chen, 1992）。換言之，以馬列主義為最高指導思想，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參考西方經驗，斟酌本國國情，由中共中央訂定教育指導原則，全國一致遵行，毫無例外。

1983年9月鄧小平出了「三個面向」的說法，認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即是要重新界定教育在中國大陸進行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例如：教育體制是否能適應經濟發展，教育改革能否符合中國國情的需要等問題。其次，面向世界，即是在進行本國教育改革時，必須因應世界潮流，從整體去考量，由教育的發展背景，進一步深入了解各國的特點，透過中外比較，相互啟發與交流。最後，在面向未來時，要注意研究世界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包括中國大陸）教育發展的近期動態與長遠趨勢。比較教育研究於是負有引進最新教育訊息，技術革命的重要任務，期能對於一國教育

政策的制訂和教育改革的實施產生相當的作用。

為了因應四個現代化及經濟改革的需要，在研究主題上，多著重於科學、技術、高等教育及教育改革等方面；研究的對象大多針對先進國家，如：美、蘇、英、法、德、日和若干與中國處境相似的開發中國家。在方法論方面，則採用社會主義國家所特有的歷史、哲學研究法，尤其以馬克斯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為理論基礎的法則，強調教育也和周遭的社會現象有關，所以應由各種社會現象為出發點，來檢驗當前的教育問題（Chen, 1992；楊思偉，民82）。

二、研究機構與學會

一九七〇年代末期起，中國大陸逐漸恢復與新建一些比較教育研究機構，例如：1979年恢復的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中即設有「比較教育研究室」，另外在國家教育委員會（相當於教育部）的「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也設有「比較教育研究室」。在高等師範院校和普通大學中設立的相關機構包括：北京師範大學「外國教育研究所」（重蘇聯、東歐及美國的研究，1995年改名為「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比較教育研究所」（重歐美研究），東北師範大學「比較教育研究所」，（重日本及朝鮮教育研究），河北大學「日本問題研究所」及「日本教育研究所」，華南師範大學「外國教育研究所」（重歐美及東南亞研究），及杭州大學「比較教育研究中心」等；另外在廈門大學、華中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哈爾濱師範大學、福建師範大學、陝西師範大學、武漢大學、安徽大學等也都相繼成立類似研究機構。（註二）

由於比較教育研究及教學機構在各地陸續的成立，為了加強各地研究人員的聯繫，透過學術活動提高研究水準，因此，在1979年10月於上海成立「外國教育研究會」（1982年改為比較教育研究會），為中國大陸首次以研究比較教育為宗旨的全國民間學術團體。至於大陸各地如吉林、河南、天津、遼寧等20餘個省市也先後成立了類似學術團體。

「中國大陸比較教育研究會」為「中國教育學會」下的二級專門學會，其成立的目的包

註二：詳情請參見拙作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書「中國大陸比較教育學門之發展與評估」之附錄二，頁84-125。

中國大陸比較教育學研究之發展與評估～一九四九年迄今

括：強調四個基本原則——堅持百家爭鳴的方針、強化全國外國教育研究人員的合作、介紹外國教育狀況與從事比較教育研究、聯繫國外教育組織和進行學術交流，以對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的教育事業做出貢獻（大塚豐，1991）。

在研究活動方面，中國（大陸）比較教育研究會自 1978 年起每隔二、三年召開一次年會，截至一九九五年共舉辦了八次全國性會議，各次會議之時間及主題等事項如下：（參見表(一)）

表一 中國比較教育研究會歷屆年會摘要

年會次數	日期	會議地點	與會人數	論文篇數	會議主題重點
1	1978.07	北京	50 餘人	20 餘篇	缺
2	1979.10	上	80 餘人	70 餘篇	成立「外國教育研究會」
3	1981.05	保定	120 餘人	140 餘篇	1. 教育與經濟的關係 2. 教育行政與立法 3. 教育結構的改革 4. 師範教育的改革動向 5. 高等教育的改革趨勢 6. 近年來國外教育學理論的發展特點 7. 比較教育學的教材編寫
4	1982.07	長春	100 餘人	200 餘篇	1. 比較教育學科建設問題 2. 普及義務教育問題 3.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4. 國外高等教育改革問題 △將「外國教育研究會」改名為「中國教育學會全國比較教育研究會」
5	1986.09	武漢	100 餘人	120 餘篇	1. 教育改革中教育思想、理論問題 2. 普及基礎教育的地位與作用 3. 職業技術教育加強問題 4. 高等教育改革問題 5. 比較教育學科建設和教材編寫問題
6	1990.11	天津	100 餘人	缺	主題：教育改革與比較教育的回顧與展望 討論重點： 1. 比較教育 2. 中外道德教育 3. 高等教育 4. 普通和職業教育 5. 中外教育改革反思 6. 中外教育與對外交流 7. 西方教育思想研究
7	1993.11	北京	80 餘人	70 餘篇	主題：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比較教育 討論重點： 1. 比較教育的學科建設 2. 文化與教育 3. 市場經濟與教育 4. 比較教育教學改革
8	1995.10	濟南	120 餘人	缺	主題：亞太地區比較教育與經濟文化的發展 討論重點： 1. 比較教育的學科建設 2. 各級各類教育改革 3. 文化傳統與教育現代化 4. 市場經濟對教育發展的影響

資料來源：1. 孫啓民、陳欣，戰後比較教育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評述（未發表）。
2. 作者自行整理。

截至 1995 年第八次年會為止，參與人數最多的分別為第四屆（1982 年於長春）、第五屆（1986 年於武漢）與第八屆（1995 年於濟南）。根據大陸比較教育學者指出，每次出席年會人數的多寡除了與各單位經費支助有關外，也與整個經濟發展的大環境有關，例如，九〇年代以後，許多年輕一代的比較教育學者轉行或下海，以致出席年會的人數大幅下降（周祝瑛，民 82）。不過，亦有人持不同看法，認為參與年會人數的多寡主要還是受主辦單位的經費補助有關，與比較教育學者轉行與否的關係不大。另外，自第三屆年會起（1981.5），出現了會議的討論重點，其內容多能反應當時教育改革的需要。自第六屆起（1990.11），新增年會主題，如：比較教育學門發展的回顧，以及面對 21 世紀因應的展望思考等。第六屆年會中並提出如何開拓比較教育的研究領域；如何在研究先進國家教育狀況之外，也能針對與中國大陸臨近、且國情相似的亞洲國家進行研究等一連串的問題。到了第七屆年會中（1993.11）則特別著重在市場經濟與教育關係的討論上，例如：如何結合東西文化與現代化，以實施道德教育；如何加強各級教育對市場經濟發展的應變與調整能力；如何解決市場經濟對教育衝擊——辦學體制、招生制度及私立學校等問題。另外，台灣比較教育學著首度參加第七屆年會，除了在會中介紹台灣的教育發展與問題外，並提出應注意儒家文化圈內亞洲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比較研究，加強可比較性的背景因素，以對教育問題做出更具借鏡意義的研究。到了第八屆年會，由於結合了亞太地區比較教育發展的經驗，擴大為國際研討會，因此與會人眾多數，包括部分海外人士以及比較教育領域以外的教育工作者的參與，形成了更為多元的討論及建議。

三、研究人員背景

旅美大陸學者陳樹清（Chen, 1992）曾對北京師範大學「外國教育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比較教育研究所」、華中師範大學「教育研究室」、東北師範大學「比較教育科學研究所」，以及河北大學「日本問題研究所」等五個機構研究與教學人員加以統計分析，得到以下結果：

（一）在研究人員（包含教學人員）主修方面，有 62.8% 原主修外語，24.4% 主修教育，其他 10.49% 主修社會科學，2.33% 主修技術領域。從以上數字可見，主修教育專業背景的

反而不如外語多，這種結果可能與中國大陸比較教育的資料幾乎為原文，必須透過外文能力直接閱讀與研究有關。

(二)在語言背景方面：擅長英語的占 44.19 %，俄語 30.23 %，日語 24.42 %，德語 9.3 %，法語 8.14 %，其他 8.14 %（包括韓文 4 %，西班牙文 1 %，葡萄牙文 1 %，南斯拉夫文 1 %）。由此可見，中國大陸比較教育學者外語能力的背景相當廣泛，且多以先進歐美國家為主，對於鄰近亞洲國家如馬來文、印尼文及阿拉伯文等反而較不熟悉。

(三)在專業素養方面：就大學學歷而言，學士學位占 55.81 %，碩士學位 34.88 %，博士學位 6.98 %，沒有學歷者占 6.98 %。整體而言，擁有高學位的比例似乎較其他國家（如英、美、台灣）為低，然而部分原因為大陸學位授予法遲至 1981 年才予以公佈，許多學者在此之前接受高等教育只有畢業學歷，而無畢業學位，以致整體擁有高學位的比例並不高。隨著海外留學生的派遣以及大陸比較教育博士課程的設立，目前中青代研究人員擁有高學位的人數日漸增加，應有助於提昇比較教育研究層次。

至於在專業職銜方面，目前教授、研究員占 12.79 %，副教授及副研究員占 38.37 %，助理教授及助理研究員占 46.51 %，助教及研究助理占 2.33 %。其中副教授與副研究員年齡有偏高的傾向，中年知識份子比例稍低，顯示人才結構有斷層現象，這可能與文革的發生有關。

另外，根據作者與華東師範大學合作所進行的調查問卷顯示，針對大陸二十餘所著名高等院校及研究機構中，比較教育研究人員所占的統計，在 212 人中，教授及研究人員占 16.98 %（36 人），副教授與副研究員占 22.64 %（48 人），講師占 22.16 %（48 人），助理研究員占 17.92 %（38 人），其他占 20.28 %（43 人）。本調查結果與陳樹清統計結果相比較，發現副教授與副研究員人數仍占大多數，不過各職級人數的差距已經縮小，尤其初、中級職位的人員較為增加；至於其他部分，有六成以上為兼職人員（28 人），因此比較難加計算。

四、研究生的培育

隨著「四個現代化」與「三個面向」政策的強調，1980 年初全中國大陸約有七百所大

學院校，開始設置與比較教育研究有關的高等教育研究所或機構，約有一百個高等院校將「比較教育學」列為必修或選修課程（大塚豐，1991）。當時除了北京、華東、東北等師範大學及河北大學為較具歷史規模的大學外，另外，亦有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及華南師範大學也成為研究的據點。在研究生培育方面，北京師範大學及華東師範大學於1979年開始招收比較教育研究生，1984年開始招收博士生，其中擔任博士課程的指導教師資格要求嚴格，必須為全國學位委員會所認可的教授，如顧明遠、王承緒、馬驥雄教授等人。另外杭州大學、福建師範學院等高校也分別設碩士課程，培養比較教育研究人才。截至1989年止，授予比較教育碩士學位的機構計有十二所大學，博士學位有三所（北京師大、華東師大、與杭州大學）。以下針對比較教育碩、博士生培育的過程加以說明：

(一)碩士生：

入學資格方面，首先必須通過由國家教育委員會統一命題的「政治學」及「外語」科目，以及應考學校所舉辦的「教育基本理論」、「外國教育史」及「教育心理學」等筆試科目。通過入學考後，即進入修課階段，修業年限一般生（全職生）為二至三年，在職生為三至四年（以取得學位為主）。課程內容各所不一，大致分為：1.一般必修課（以外文、哲學或政經為主），2.主要課程（按各所規定），3.選修課（根據個人興趣且有關的科目），4.實習（八至十小時），5.碩士論文。

(二)博士生：

入學資格方面，必須是具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通過各校、所的考試，具有二位副教授以上的推薦。修業年限一般生二至三年，在職生三至四年（以取得學位為主）；修課內容包括：1.一般必修課（政治學及二種外文），2.主修（基礎理論與專業課程），及3.博士論文。

(三)研究生導師：

導師的主要任務在於指導學生個人學習計畫的擬訂，以建立研究問題的基礎及確立學習目標；其次在開設各主修課程，以及指導學生論文寫作。導師的資格相當嚴格，碩士生導師須具備副教授以上的資格，且有一定研究水準。博士生導師則須具備教授資格，在學術上有卓越成就，擁有至少一份出版學術著作，曾擔任高級研究計劃主持人，並具有指導研究生的

實際經驗。

五、研究成果與出版

由於研究經費上的限制，中國大陸比較教育學門的研究課題，往往必須獲得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中比較教育學科規劃組的重點支助，才能進行。例如，1979年春天第一次規劃的全國51項重點研究項目中，屬於比較教育的課題包括：「現代教育改革研究」、「外國高等教育機構理工科系的比較研究」、「外國教育史」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教育」等項目。1983年第二次規劃會議中屬於比較教育研究的項目包括：「戰後的蘇聯、美國及英國教育研究」、「比較教育的基礎理論研究」、「比較高等教育」，與「東南亞各國的教育研究」等專題。1987年第三次會議中批准的研究項目有：「當代國外教育思想研究」、「各國高等教育比較教育論」、「現代教育與國家發展」、「日本教育發展戰略研究」、「比較德育」及「澳洲教育研究」等十個課題，約占當年全國教育重點研究的五分之一強。由此可見，比較教育學研究頗受中國大陸當局的重視，提供相當經費予以資助。從上述補助的重點課題中看出，比較教育學研究的重點，各個階段雖有不同的重點與研究國別，但近年來由原先歐美先進國家的教育研究，逐漸轉向對臨近的日本、澳洲等國教育經驗的重視；此外，對於學科基本理論與思想史哲的研究也不時予以強調。至於在比較國別的實證研究方面則甚少提及。

另外，在比較教育學專門著作方面，截至1995年止，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孫啓林，陳欣，1995）

(一) 學科教材：

(1) 《比較教育》（1983）

由王承緒、朱勃與顧明遠主編，採用問題排列方式，比較蘇、美、日、英、法、德等六國的學制、學前教育、初等教育、普通中等教育、中等職業技術教育、高等教育、師範教育和教育行政等問題，為1940年以後第一本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比較教育專著。

(2) 《比較教育學》（1989）

該書曾在台灣出版，由吳文侃、楊漢清主編，全書採用綜合體系，共分四篇：第一篇為緒論，介紹比較教育學的定義、研究方法、和歷史發展；第二篇分別敘述蘇、美、日、英、法、德、中國大陸及印度等八國教育概況；第三篇則以問題方式，介紹幼兒、基礎、職業技術、高等、師範及成人教育等各級各類教育的發展概況及未來趨勢；最後一篇則以總結與展望的形式，分析影響各種教育的主要因素，以及世界教育發展趨勢等。

- (3)除了上述兩部外，尚包括成有信的《比較教育教程》、高如峰和張保慶的《比較教育學》、張維平和張詩亞的《比較教育基礎》、以及薛里銀的《比較教育學方法論》等教育專著。
- (4)另外，許多翻譯專著也受到大陸的重視，如：日本沖原豐的《比較教育學》、蘇聯索洛納娃等的《比較教育學》，和英國艾德蒙金的《別國的學校和我們的學校》等。

(二)單一國別的研究叢書：

- (1)《戰後國際教育研究叢書》：

本書是以一國或地區的教育發展為對象的「個案研究」(case study)，透過某一主題或角度，深入分析與探討歐美先進國家與亞非開發中國家的教育發展與改革問題，以作為中國大陸教育改革中的經驗參考。叢書中包括：由顧明遠主編的《戰後蘇聯教育研究》、梁忠義主編的《戰後日本教育研究》、馬驥雄主編的《戰後美國教育研究》、王承緒和徐輝主編的《戰後英國教育研究》、孫啓林主編的《戰後韓國教育研究》，以及趙中建編著的《戰後印度教育研究》等。

- (2)《當今世界教育概覽叢書》

本叢書除了介紹英、美等國教育制度外，並首度對芬蘭、瑞典、新加坡、墨西哥等國家予以介紹分析。個別的著作包括：《今日美國教育》、《戰後日本教育與經濟發展》、《西德的教育與經濟發展》、《現代外國教育》、《六國教育概況》、《七十國教育概況》，以及《當代日本教育叢書》等。

中國大陸比較教育學研究之發展與評估～一九四九年迄今

(三)微觀的研究著述：

以鍾啓泉、杜殿坤和楊玉厚主編的《求索》叢書為代表。該叢書依照中國大陸教育發展的歷史與現狀，尤其針對當前的教學和課程改革需要，引進國外先進國家在課程沿革、教學的研究所發展出來的理論基礎與實證經驗，提供中國大陸教育革新的參考。叢書中包括：《教育科學新進展》、《國外課程改革透視》、《美國教育論流派》、《中國課程變革研究》、《比較教育學論》以及《現代課程論》等十種著作。另外，若干過去視為敏感性較高的所謂“研究”禁區，也有所突破，如馮增俊的《當代西方學校道德教育》，與張志義的《八國兩地區的德育》及《私立民辦學校的理論與實踐》等專書皆屬於這一類。

(四)各級各類教育著作：

這類作品包括範圍較廣，主題分歧也較大，例如：符娟明主編的《比較高等教育》、梁忠義的《七國職業技術教育》、蘇眞的《比較師範教育》、成有信的《九國普及義務教育》、以及周蕖的《中外職業技術教育比較》。此外還包括由人民出版社編輯的《外國教育叢書》，如：《五國普通教育》、《高等工程技術教育》、《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改革》、《師範教育的現狀和趨勢》、《高等學校的科學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學前教育》以及《外國成人教育》等。

(五)資料性的書籍：

這類書籍著重在蒐集各國教育改革的主要沿革及資訊參考，例如，由國家教育發展中心編輯的《發達國家教育改革的動向和趨勢》，即蒐集了八〇年代以來美、英、法、德、日、蘇等國頒布的有關教育改革的政府文件、法案和重要報告，提供各國主要教育改革法令依據和發展訊息。此外，由瞿葆奎主編的二十六卷《教育學文集》中，包含《三十五國教育發展史》、《世界教育發展新趨勢》，以及蘇聯、美國、法國、德國、英國、日本、印度、巴西與埃及等國的教育改革等，除了介紹各國教育改革的法案、文獻資料，並包括對教育改革具有影響力的報告書或評論文章，是一套具參考價值的比較教育工具書。此外，由北京師範大學所編輯的《蘇聯高等教育政策法令彙編》及《蘇聯普通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政策法令彙編》，則是有關前蘇聯教育政策及法令方面的著作，可說是大陸教育法制化的重要參考。

此外，由顧明遠主編的《比較教育叢書》已於 1995 年出版，此叢書主要包含：了解中

國大陸教育改革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與困難；探討當代世界教育發展的最新動向，包括先進及開發中國家，尤其對亞洲幾個新興工業國家（地區）教育改革的介紹；最後並對比較教育學科發展的新理論、新方法加以評述分析。最後，在第八屆比較教育年會中，與會人士並提出「世界教育大系」的集體創作計劃，內容針對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社會教育及婦女教育等多個主要領域加以論述，預計一、二年內完成。

總之，從上述五類比較教育的研究成果看來：研究範圍十分廣泛、主題多所重複、經由集體創作的力量下，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出版。在研究重點上，多重視以本國教育實況需要為主要內容，強調歷史發展法則及改革現狀。而其主要缺點則在於受限於第一手資料的不足及實證研究的欠缺。

除此之外，目前在中國大陸公開發行的比較教育學術性刊物包括下列七種：

- (一)《外國教育》，雙月刊，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和全國比較教育研究會合編（已停刊）；
- (二)《外國教育動態》，雙月刊，北京師範大學外國教育研究所編，1992年改為《比較教育研究》；
- (三)《外國教育資料》，雙月刊，華東師範大學比較教育研究所編；
- (四)《外國教育研究》，雙月刊，東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編；
- (五)《外國中小學教育》，雙月刊，全國比較教育研究會委託上海師範大學主編；
- (六)《世界教育文摘》，季刊，華南師範大學外國教育研究所編；
- (七)《外國教育參考資料》季刊，福建師範大學教育系、教育科學研究所編。

在上述七種期刊中，以《外國教育動態》（後改為《比較教育研究》）的研究水準最高，堪稱作中國大陸比較教育研究的全國代表性專業雜誌，其地位甚至超越由中央教科所及全國比較教育研究會所編的《外國教育》之上。另外，《光明日報》、《中國教育報》、《人民教育》、及《教育研究》等報章雜誌也經常刊載比較教育或外國教育的訊息。

肆、比較教育期刊之內容分析

本研究針對1977年至1995年中國大陸比較教育學術研究的四種重要的期刊之4,011篇

文章，進行研究主題之內涵分析、譯著與創刊數（即寫作方式）分析、比較國數分析、與比較國別分析等四大項目。期刊內容包括：(1) 1980 至 1995 年「比較教育研究」（原名：外國教育動態），由北京師範大學外國教育研究所編輯；(2) 1982 年至 1993 年「外國中小學教育」，由上海師範大學外國教育研究所編輯；(3) 1977 年至 1992 年「外國教育資料」，由華東師範大學外國教育研究所編輯；(4) 1993 年「外國教育研究」，由東北師範大學外國教育研究所編。（註三）

一、四種期刊研究主題中所顯示之發展趨勢

首先，根據「比較教育研究」、「外國中小學教育」、「外國教育資料」和「外國教育研究」四種期刊總合之主題分析結果顯示，以「教學方法」與「教育學理論」所占的比例最高，其次是「高等教育」。自 1989 年以後的發展趨勢而言，「教學方法」、「教育政策」、「師資教育」、「道德教育」及「教育督導」有愈來愈受重視的趨勢。

其次就寫作方式而言，四種期刊以編著（占五分之三）為最多，其次為「譯著」。自 1990 年起，編著之寫作方式增至 70 % 以上，顯示寫作方式已逐漸脫離翻譯外國作品的方式。

再者，就比較國數而言，以單一國家的介紹最多（占 83 %），三國比較最少，但「三國以上」的世界性比較之文章有愈來愈多的趨勢。

最後，在有關研究國別方面，以美國（占 28 %）最多，其次為日本、蘇聯，而對中國大陸及台灣地區的研究都很少。

二、本研究與陳樹清研究結果之比較

大陸留美學者陳樹清（Chen, 1992）研究 1979 年至 1989 年中國大陸有關比較教育研究的四種重要雜誌，以「外國教育動態」、「外國教育」、「外國教育參考資料」及「外國教育研究」等四種期刊中的 2,697 篇文章為分析對象。就研究主題而言，陳樹清之研究概分

註三：同註二。

為九類，其中以高等教育、初中等教育、其他、教育學、教育制度較高，與本研究結果之教學方法、教育學理論、高等教育、初中等教育、教育政策、教育制度相類似（因本研究已將教育學主題分為教學方法與教育學理論兩大類，在教育制度方面本研究分類為教育政策與教育制度以便於區分）。

其次，陳樹清研究發現中國大陸 1979 年至 1989 年十年間的比較教育研究以「高等教育」所占比例最高，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四類期刊皆以「高等教育」為最重要之探討主題之故，例如：「外國教育」期刊之高等教育主題就占了 24.28%，「外國教育參考資料」占 16.34%，「外國教育研究」占 23.65%。分析 1979 年至 1989 年中國大陸環境，可能是急於趕上先進國家，因此著重於研究先進國家的高等教育與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關係，因為高等教育能提供中國大陸四個現代化的科技人才，所以特別受到重視。反觀本研究結果以「教學方法」為最高，可能因本研究中探討之期刊「外國中小學教育」係以教學方法為其重要之主題，因此提高了所佔之比例。另方面，也可能是 1990 年以後，教學的技術、課程、教材教法等基本主題受到重視的緣故。

就研究國別而言，陳樹清指出 1979 年至 1989 年最受中國大陸比較教育重視的國家分別為日本、蘇聯、美國及一些歐洲先進國家，與本研究之結果相類似，探討其原因，可能是為學習西方先進國家的經驗，作為改革之依據及參考。但在 1990 年以後，其研究國別似乎偏重以「美國」為主，顯示其改革重點為「經濟」導向。

三、本研究與大塚豐之研究比較

日本學者大塚豐（1991）研究 1980 年至 1989 年中國大陸之「外國教育動態」雜誌，發現其揭載之論文翻譯比率為 39.3%，研究對象國以美國、蘇聯、日本最高，與本研究結果相類似。但在 1990 年後，論文翻譯之比率逐年降低，顯示中國大陸之創作、著作的能力在提高當中；至於研究國別上以美為最重要，而蘇聯則降低最多。在研究主題上以「教育理論思想」最高，但在陳樹清及本研究皆以「高等教育」最高，探究其原因可能是大塚豐之主題分類與陳樹清及本研究分類方式不同之故。

伍、比較教育學研究發展之評估

一、與比界比較教育研究發展之對照

從世界各國比較教育學門發展的趨勢來看，中國大陸比較教育學的演進——尤其在 1949 年以後的學門建立過程中，多少受到世界發展潮流的影響，但又維持本身相當的特性。誠如顧明遠在 1990 年「第六屆中國比較教育年會」上所提出的三大批評：1. 中國大陸比較教育研究脫離了本國教育的實際狀況；2. 研究缺乏理論依據；3. 不重視比較教育學本身的學科研究（顧明遠，1991）。王承緒也在 1993 年第七屆年會上呼籲：1. 必須修訂比較教育課程及教材，集合大陸比較教育師生從事集體創作；2. 大量翻譯、介紹世界比較教育之名著及方法論書籍；3. 從事個別研究或區域研究，針對各國教育改革重點，提出有系統、有計劃的研究方針；4. 以專題或問題取向（issue-oriented）的方式，進行比較教育專案研究；5. 編纂比較教育年鑑、整理東、西方比較教育之發展歷史與現況，作為參考借鏡之用。（周祝瑛，民 82）。從整個學門的歷史發展上看，儘管比較教育研究在中國大陸因屢受政治運動的波及而起伏，然而在文革結束後的十年間，比較教育學門的急速擴張與專業性質的確定，皆為有目共睹（大塚豐，1991）。有人甚至稱文革後十年為「比較教育研究發展的黃金十年」（Chen, 1992）。甚至到了 1985 年以後，比較教育的研究仍被納入中國大陸「七五」（1986 ~ 1990）和「八五」（1991 ~ 1998）計劃中的發展重點。由此可見，中國大陸為了學習西方先進國家的經驗，作為改革的參考依據，以致比較教育研究成為學習西方經驗的窗口，而備受重視。換言之，比較教育研究在中國大陸充滿了實用性與工具性的色彩，在受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多重影響下，比較教育學的研究始終不出以下三個特點：(1) 依照社會主義路線，受政治因素影響大；(2) 符合中國現代化的需要，從中國本身實況作出發，向外借鑑西方經驗；(3) 「西體中用」的色彩濃厚，雖有龐大的研究隊伍及專業機構，但因受意識形態所限，以及外來資料和方法論的不足，整個研究水準仍有待提昇（Chen, 1992；大

塚豐 1991) 。

進一步地說，根據世界各國比較教育學發展過程中的爭議，首先就方法論而言，中國大陸比較教育學研究在此方面上比較薄弱，大多採用歷史及哲學的研究法，且停留在 G. Bereday 所說的描述 (description) 與詮釋 (interpretation) 階段，至於涉及併排 (juxtaposition) 及比較 (comparison) 的研究則少見。以前面四種比較教育期刊的分析結果看，「單一國家」的介紹最多 (占 83 %)，二、三國的比較文章甚少，尤其他國與中國大陸的比較文章更為罕見。

至於以實證科學的方法論、系統化的研究步驟、去蒐集與處理資料的量化研究更少。而以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去檢視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教育制度，又牽涉到資料蒐集的困難（外語能力所限及出國考察不易），較難跨越疆界，從事第一手資料的深入探討。從研究理論的角度來評估，中國大陸比較教育學在此方面顯然有別於世界比較教育的發展趨勢，大多採用唯物辯證法為理論基礎。由於六〇年代與七〇年代中國大陸對西方的理論基本上採取否決及封鎖的態度，因此，西方社會科學界所產生的各種主義與流派對中國大陸學界影響甚少；反而是歐美各國受到馬克斯主義及新馬克思主義的衝突理論和現象學等理論的重新復活所影響。如果勉強地對照，中國大陸比較教育研究所採用的理論或與衝突理論及依賴理論較為接近；而現代化理論隨著大陸市場經濟的建立，影響當局與學界對「人力資源」與「教育成果」的逐漸重視。此點可由中國大陸第三、五、七次比較教育年會討論議題中看出；（參見表(一)）另外，從 1989 年以後，「教育經濟學」主題逐漸在「比較教育研究」期刊中出現的文章比例中，也可看出此種趨勢。至於「後現代主義」所討論的內容，如：對個人主體性與多樣性的重視，回歸教育的自主性，及避免學校淪為獨裁者灌輸一元化價值等討論，在大陸上，則限於四個堅持的提倡尚不成風氣。

最後，根據研究主題來看，從比較教育研究至今歷屆年會重要議題及上述四種期刊分析結果發現：「教育方法」、「教育學理論」及「高等教育」出現的比例為最高；其中又以探討美、日、蘇三國的教育論文最多；寫作方式則以編著最多（占五分之三），且逐漸擺脫過去以翻譯國外著作的方式。換言之，文革以前的研究主題多以蘇聯教育為主，文革以後則轉向以西方先進國家教育經驗的借鏡為重點，如：各國教育制度、學校制度、教材教法、行政

事務及教育改革之了解等，較少深入去了解形成各國教育制度的社會、文化等背景因素。至於有關少數民族、婦女研究、學生人權及教育公平性等重視以人為主體的研究則較為少見。總之，在主題選定上，多為了因應四個現代的需要，如：研究歐美高等教育是為了培養「四化」所需的科技人才。至於對和中國大陸處境相似的第三世界國家，如：亞、非地區及拉丁美洲國家的研究，則到九〇年代才開始漸受重視。對台灣地區教育發展的研究主題也是兩岸交流以後才陸續出現，不過在數量上仍占非常微小。

二、海峽兩岸比較教育研究之對照

綜合本研究及蔡清華（民 78）對台灣地區比較教育學研究發展之調查，海峽兩岸比較教育學門發展有以下異同（參見表(二)）（註四）：

(一) 相同部分：

兩岸皆於 1970 年代成立研究學會，且定期召開議及出版刊物；在研究方面，方法上多採用歷史法與文獻法，較少前往他國或地從事第一手資料之實證研究工作；民族誌研究模式從未出現；分析單位皆以單一國家介紹為主，缺乏區域或世界體系之研究；研究國別中，以美、日為最多。至於本土性的研究，台灣多於大陸（前者占第三位，後者自 1991 年才開始事本身大陸教育之研究）。兩岸共同的缺點為比較研究方法及理論依據之薄弱；第一手資料及研究人力之不足等。

(二) 不同的部分：

諸如：大陸比較教育研究會的年會曾於文革期間及八九天安門事件而中斷，台灣則每年連續舉辦；大陸比較教育研究與教學機構歷史較久，規模較大，且專業分工較細，期刊較多；而台灣各師範院校雖有比較教育課程，但獨立的研究所到目前只有一所，且 1995 年才成立。大陸的比較教育叢書多，出版速度快，且涉及範圍甚廣；台灣則多以每年專書為主，由不同作者共同寫作而成。以研究人員而言，大陸有為數不少的比較教育研究生、研究人員及大學教師；台灣則多以大學教師為主，數量有限。至於語言方面，台灣缺乏俄文人才，兩

註四：此部分曾訪問大陸比較教育研究會會長顧明遠教授與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秘書長楊思偉教授，綜合其意見與相關著作而成。

岸人員同時缺乏亞洲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外語能力。在研究主題方面，大陸以教學方法、教育學理論及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最多；台灣則多從教育制度與學校制度等問題著手，最近逐漸重視非正規教育及終生教育等議題，不過，對於教育與社會之關係的研究甚少，對比較方法論之題材則幾乎未見。最後在研究的意識形態方面，大陸多以馬列主義為基礎，台灣則傾向結構功能理論。

表二 海峽兩岸比較教育學研究發展之對照

	中國大陸	台灣
學會名稱	1979 年成立「外國教育研究會」，1982 年改名為「中國教育學會全國比較教育研究會」	1974 年成立「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
年會	每 2 ~ 3 年召開一次，截至 1995 年共八次，文革與天安門事件年會中斷。	每年召開一次，截至 1995 年共 21 次，未曾中斷。
代表刊物	1964 年創辦「外國教育動態」，1966 ~ 1972 年停刊，1973 年復刊，1992 年改為「比較教育研究」。	1982 開始發行「比較教育通訊」，每年三期。
研究及教學機構	1964 年以後先後成立北京師大「外國教育研究所」、華東師大「比較教育研究所」、華南師大「比較教育研究所」、杭州大學「教育系」等。	1995 年暨南國際大學設立「比較教育研究所」
會員	600 餘人 博士 6.9%，碩士 34.9%，學士 55.8%	500 餘人 博士 35.9%，碩士 50.5%，學士 13.0%
外語能力	英語 44%*，俄語 30%，日語 24%，德語 9%，法語 8%。	留美 64.9%，留英 5.9%，留日 16.5%，留德 5.9%，其他 4.7%
年會主題	1990 年「教育改革與比較教育的回顧與展望」 1993 年「面向 21 世紀的比較教育」 1995 年「亞太地區比較教育與經濟文化發展」	自 1975 年起依次為「比較教育」、「教育改革」、「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師範教育」、「技術職業高等教育」、「大學入學制度改革」、「學制改革政策與展望」、「教育行政」、「終生教育」、「各國教科書」、「各國中小學課程」、「國際比較師範教育」、「兩岸教育發展」、「邁向 21 世紀之教育改革」、「文化傳統與教育現代化」、「後現代化主義與教育」
研究主題內涵	教學方法、教育學理論、高等教育占大多數	教育制度與學校制度為主
研究方法	歷史法、文獻法	歷史法、文獻法
分析單位	單一國家占 78.8%	單一國家占 74.7%
研究國別	美國 28%，日本 17%，蘇聯 16.6%	美國 18%，日本 17%，台灣 15.8%，德 13.5%
研究的意識形態	馬列主義之研究，人文主義及批判主義的研究數量甚少。	人文主義 10%，結構功能主義 88%，批判主義 2%

* 註：表有人擅長兩種以上的外語。

三、中國大陸比較教育研究之未來趨勢

大陸留美學者陳樹清（Chen, 1992）曾採用 Hawkins (1986) 的學術模式（academic

model) 與革命模式 (revolutionary model) 來說明 1949 年以後中國大陸比較教育發展的過程，大致可分為：(1) 1957 ~ 66 及 1966 ~ 76 年：為比較教育的革命模式階段，此時期比較教育學研究因受禁止而中斷；(2) 1949 ~ 56 及 1978 ~ 迄今：學術模式階段，比較教育為因應國家建設之需，頗受重視。到了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 (1989)，上述兩種模式持續交替，雖然六四之後，比較教育的學術地位略為下降，但由於人們普遍不願再重蹈文革覆轍，因此革命模式未被再強調。到了九〇年代，在當前大陸市場經濟改革壓力下，比較教育面臨調整與適應的問題，試圖從國外發展經驗中，找出本國教育模式之參考。例如：一九九五年北京師範大學的「外國教育研究所」改名為「國際和比較教育研究所」，即是希望改變過去比較教育領域多以外國教育研究為主的印象，轉而將重點放在以解釋大陸教育問題為優先的考量。此外，當前市場經濟對於從比較教育研究人員的衝擊，是否會影響其原先教學與研究的工作意願，甚至改行「下海」經商——由於這些人大多具備外語能力，教育水平高，另謀出路應不困難。可見人員的流失，為比較教育學研究的第一個隱憂。由於大陸上資訊流通與轉移的困難，使得許多研究因資料蒐集的不易，而缺乏說服力；再加上有些研究論文很少在文章最後加上註釋或資料來源，使得研究結論備受質疑，此其二。許多研究在完成時，由於社會需求甚殷，有時會立即採納國外現有的經驗——如：教材、課程或教學方法——將這些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研究成果轉移到自己的國家，卻未深入了解其社會背景與歷史文化，其移植後水土不服的結果令人不難預見，此其三。（大塚豐，1991）

前大陸國家教育委員會「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蔣克勇曾指出，本世紀末大陸教育的發展目標為：「實現兩個基本」（基本上實現九年義務教育、基本上掃除青壯年文盲）、「完成三個積極發展」（積極發展技術、成人與高等教育）、「突破四個重點」（建立一百所重點大學、若干綜合學科、重點高中及職業學校）。在辦學體制改革方面，改變政府過去包攬辦學方式，發動社會各階層、多渠道、多形式辦學，尤其針對高等學校的招生，收費及就業方式大規模改革。至於在教學改革上，則朝向不同類型、不同規格的人才進行培養，及加強學生的道德教育。（周祝瑛，民 83 ）為了因應整個大環境的變化，配合大陸教育改革的需要，1995 年 10 月比較教育第八屆年會與「亞洲教育與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同時舉行，並規劃“九五”計劃（1996 ~ 2000 ）的發展方向，其內容包括：（孫啓林、陳欣，

1995)

- (1)加強比較教育應用研究：從基本理論的探索走向社會現實的需要，提供「四化」所需的可行改革方案。
- (2)深入比較教育的基礎研究：持續進行大量的基礎研究計劃，並做好追蹤（follow-up）工作。
- (3)開拓新的研究領域：由過去制度、政策層面的講求，開創新的研究領域，如：比較教材法、比較課程研究等。
- (4)繼續充實比較教育學門本身學科的研究，如理論的建立、方法論的加強，與外語能力的培養。
- (5)反應時代需要，進行當前迫切之議題，如：市場經濟與教育改革、教育經濟與財政比較研究、傳統文化與教育現代化、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教育發展策略（如先進國家、港、澳、台教育改革與實踐經驗）、弱勢團體之教育機會（如婦女、殘障教育）、道德教育、教育立法研究、課程改革、以及師資培育等課題。

總之，誠如顧明遠與薛理銀（1995）在北京師範大學國際和比較教育研究所三十週年所慶專刊中所提到的，中國大陸的比較教育研究專家，一方面透過對國際教育的研究，了解國外教育發展的狀況，提供解決大陸教育問題的借鏡；另一方面要協助國內有關的人員（包括教師）從事具體的實踐活動。換言之，教育知識的國際化與本土化研究，以及如何從理論研究轉向應用層面，進而反應時代需要，可說是當前中國大陸比較教育學研究所面臨的重大課題。

參 考 文 獻

大塚豐（1991）中國比較教育學回顧展望。日本比較教育學研究，17期。

金世柏（1993）。比較教育研究也要解放思想，跨上新的台階。發表於中國大陸比較教育研究會第七屆年會，北京。

吳文侃、楊漢清（主編）（民81）。比較教育學。台北：五南。

中國大陸比較教育學研究之發展與評估～一九四九年迄今

- 吳盤生（1992）。略論比較方法與比較教育。教育研究（大陸），3。
- 周祝瑛（民82）。大陸比較教育研究會第七屆年會參加經過與感想。中華民國比較教育通訊，32期，頁39-44。
- 郭笙（主編）（1989）。新中國教育四十年。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 徐輝（1991）。外國教育研究與我國教改實際。教育研究（大陸），11。
- 孫啓林、陳欣（1995）。戰後比較教育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評述。未發表。
- 楊思偉（民80）比較教育基本概念。中華民國比較教育通訊，26期，頁7-15。
- 楊思偉（民82）。比較教育學研究的歷史與趨勢。教育研究雙月刊。
- 蔡清華（民78）：中華民國比較教育研究之檢討。中華民國比較教育通訊，20期，頁8-19。
- 黎安琪（1992）。國際教育和比較教育研究的未來趨勢。杭州大學學報，4(69)。
- 顧明遠（1990）。比較教育的回顧與展望。教育研究（大陸）。
- 顧明遠（1991）。比較教育的回顧與展望。外國教育動態（大陸），一期。
- 顧明遠、薛理銀（1995）。教育國際化與比較教育學的課題。比較教育研究（大陸），所慶專刊。
- Altbach, P. & Kelly, G. (1986). New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education.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en, Shu-ching (1992). Comparative education stu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SUNY, Buffalo.
- Hawkins, J.N. (1986)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N.Y.: Praeger.
- Noah, N. & Eckstein, M. (1985). Dependency theory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Prospects, 15(2), 213-225.
- Regin, C.C. (1989). The comparative method. C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Zachariah, M. (1986).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in Altbach, P. & Kelly, G (eds.). New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education.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